



中央苏区

八十年前的赣南闽西，是中华大地上一块充满血与火、激情与创造的赤土。在此建立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是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进行了武装斗争，执政为民的伟大实践。本书以流畅的文字再现了这段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历史……

刘晓农 著

Zhongyangsuqushihua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史话

中央苏区

Zhongyangsuqushihu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苏区史话/刘晓农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210-04820-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央苏区—史料
IV. ①K269.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2499号

中央苏区史话

刘晓农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九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211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978-7-210-04820-6 定价:22.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1—216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86898827 电话:8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言	1
一、柏露定计：“围魏救赵”	4
二、冲出“重围”，会师“东井冈”	9
三、入闽西，汀州变策	16
四、辛耕别墅里的喜庆	21
五、“君命”有所不受	26
六、红四军“七大”风波	31
七、毛泽东神秘“失踪”	36
八、毛泽东出山	40
九、古田会议	46
十、“二七”会议开新局	51
十一、对“立三路线”的巧妙抵制	58
十二、红一方面军撤攻长沙	63
十三、攻克吉安	69
十四、罗坊会议定大计	75

十五、遏制肃反狂潮	80
十六、诱敌深入，“一反”获全胜	87
十七、青塘息争，横扫七百里	93
十八、“骆驼过针眼”，险中取胜	100
十九、钻通“牛角尖”，出奇制胜	108
二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	115
二十一、治国安民栋梁材	122
二十二、苏区女杰	127
二十三、宁都兵暴	132
二十四、攻打赣州失利	139
二十五、东路军漳州奏捷	145
二十六、毛泽东：宁都会议失军权	151
二十七、四破铁围	157
二十八、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	164
二十九、中共中央机关迁人瑞金	168
三十、苏区建设，如火如荼	172
三十一、反腐肃贪，苏区干部好作风	180
三十二、反“罗明路线”	186
三十三、“毛派头子”邓小平落难	192
三十四、洋顾问李德的到来	198
三十五、洋顾问导致的糟糕战局	204
三十六、坐失“闽变”良机	210

三十七、查田运动	216
三十八、困境中的毛泽东	221
三十九、全苏“二大”的召开	228
四十、广昌失守	234
四十一、最高“三人团”的组成	240
四十二、“铁桶计划”与南线秘谈	245
四十三、大军突围西征去	252
四十四、英勇的留守	258
结束语	264

引 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敌人的血腥屠杀中奋然跃起，为挽救革命危局继续战斗，这种党领导下的努力奋战，在横断大半个江西、福建的赣西南和闽西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显著的特征是党在这里开创了缔造人民军队、实行土地革命、创建工农红色政权的新时期。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切记取的告诫。为了重整旗鼓，党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卓越的军事才干与指挥艺术，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队，举行了南昌起义。正是这次起义，才使我们党拥有了一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人民军队。

利用秋收季节阶级斗争更为激烈的时机，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也是对敌人进行回击的重要举措。党的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新的中央政治局指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的秋收暴动。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起义军犯了分兵击敌、疏于防范的错误，各路部队都打了败仗，湘赣边秋收起义失利。在“军威因是不振”、“竟致溃不成军”的情势下，前委书记毛泽东果断传令各路部队退出战斗区域，开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否定师长余洒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以工农革命军的严峻现实说服前委的其他同志，提出按照湖南省委制定的《湘南暴动大纲》之计划，退兵湘南汝城，

占据湘粤大道,以策应贺龙、叶挺的部队再次北出广东。

工农革命军行至莲花,轻取县城。宋韵琴(宋任穷)携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密信,指示“毛部应退赣西宁冈,因为那里有我党领导的一支队伍”。毛泽东向莲花的同志了解到宁冈一带为“金刚山”范围,联系到工农革命军剩下不到千人的现实,决定再弃退向汝城的计划,转兵割据条件更为优越的井冈山。1927年9月底,工农革命军在永新三湾经过改编,与红色的“山大王”袁文才以及中共宁冈县党组织接上联系,经宁冈古城进驻茅坪,在湘赣边界实行武装割据。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部队以及湘南暴动的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胜利会师。

在井冈山,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以“工农武装割据”为母体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破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上对我党的思想桎梏,揭开了将党的力量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帷幕。

毛泽东、朱德等人对革命发展的认识没有停留在守旧不变的模式上。他们从敌人重兵围困井冈山以及边界的经济陷入困难等因素考虑,决计由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牵制敌人,红四军主力征战赣南闽西,开创比井冈山范围更大的割据区域,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形成越燃越旺的燎原之势。

与井冈山武装割据蓬勃展开的同时,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夏,党在赣西南、闽西领导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其中规模宏大的有万安暴动、东固暴动、龙岩后田暴动、上杭蛟洋暴动、永定暴动以及赣县大埠、信丰、于都、寻乌等县的农民暴动。这些以打击反革命势力为目标的武装暴动,不仅为赣西南、闽西人民树立了一面面重振革命的旗帜,坚实地打造了这

些区域党和群众的斗争基础，而且在实践中探索出许多有益的红色割据的经验。如毛泽东曾将东固割据的斗争模式誉为“李文林式”，将其与“朱毛式”“贺龙式”“方志敏式”之根据地模式相提并论。这些不断得到巩固的红色区域，在1929年5月后渐渐地连接在一起，为赣西南苏区、闽西苏区的形成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完整建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柏露定计：“围魏救赵”

1928年12月中旬，正是寒冬季节，彭德怀率领中国红军第五军主力800余人到达井冈山。朱、毛红军又多了一支智勇双全的劲旅，割据了一年四个月的井冈山红色区域增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

红五军与朱、毛红四军联袂井冈山的消息，使国民党南京政府感到震惊与恐慌。蒋介石在震怒之余，发出了“换将会剿”的命令，决定撤换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湘赣剿匪总指挥”一职，由湘省政府主席何键取而代之。

接到南京政府的严令，何键不敢懈怠。他在江西的萍乡召开两省军事会议，举行就任仪式，制订“会剿”计划。其军事部署是从两省抽调18个团以上的兵力，在1929年1月20日前进入指定作战地点。

湘赣敌军秣马厉兵大举进攻井冈山的情报陆续传到了前委及红四军军部。恰在此时，中共江西省委通过吉安县的地下交通线，转来了已传递半年之久的中共“六大”文件。毛泽东对朱德说：开一个范围大一些的会议，一则传达中央的文件，二则对两省的“会剿”作一个研究，拿出应对的策略。朱德回道：“这一次两省调集重兵，言传还有飞机助战，恨不得一个早晨踏平井冈山。咱们是得要认真对付呐！这会由前委来开吧。”

1929年元旦过后，正是滴水成冰的大冷天。从1月2日起，往日平静的井冈山柏露村忽然人多了起来，边界各县的负责干部及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委员纷纷骑马赶到。前委秘书谭政、黄春圃等人在村口的横店布置好了会场。

1月4日清晨,毛泽东与朱德等人从新城骑马赶到。毛泽东进到横店向贺子珍要过名册,见总共来了64人,所通知的代表均已到齐。此次前委召开的联席会议,参加人员为边界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及各县县委主要负责人。

会议开始之前,毛泽东向众人介绍了彭德怀与滕代远,因为多数地方干部对他二人还不认识。接下来朱德讲了联席会议的内容,宣布正式开会。

会议的第一个程序,是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传达中共“六大”的文件。



柏露会议旧址

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明确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指出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实行废除剥削和打倒封建势力内容的土地革命;提出了现时党的任务,指

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党的路线是争取群众,要用一切力量做组织民众斗争的工作,各个割据区域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工农红军,建立红色政权。

4日下午起,会议进入重要议程:讨论如何应对湘赣两省敌人的第三次“会剿”。

对于井冈山面临的严峻军事形势,每一个与会者都是清楚的。讨论一开始,就有部分干部主张奋起迎战,利用山险击退敌人。袁文才、王佐、伍中豪、宛希先等“主战派”都显得很有决心与信心。

随后,一些对敌人占绝对优势担忧的干部发言,他们认为不可盲目死守,弄不好会把老本丢光。他们主张红军应该跳到山外避免与敌作战,以盘旋式的战略,在井冈山四周打圈子。

两种不同主张的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一个下午很快过去了。

翌日,会议继续讨论。屋外,依然寒风凛冽,雨雪霏霏,店内也依旧人声鼎沸,争论激烈。

一直没有发言的彭德怀眼见争论还在持续,不由地提高了声音说道:“这么大的战略方针,前委肯定有所考虑,不知是个怎样的打算,请泽东同志讲讲吧。”这话得到了多数人的附和,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毛泽东迎着所有关注的目光,徐徐地讲开了:

“我看不能死守,敌人强于我们五六倍,且装备精良,表现了很大的决心,气势不谓不凶,死守无疑会招致失败。”

听到毛泽东这样说,袁文才、王佐、伍中豪等人有些泄气。

“不过,跳到山外去盘旋也不行,等于丢掉井冈山不管,我们在此间经营一年多,好不容易建立了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这块革命的根基之地千万丢不得!”

听了毛泽东颇为激动的话语,主张外出打圈的干部又感到不对劲。

毛泽东到底是怎样的主张？许多人疑惑不定。这时，他们又听得毛泽东提出另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经济的问题，那是我们决然不可忽视的！边界的土豪已是打尽，筹款不易，物资菲薄已极，伤病兵其苦更甚，五千余人的衣食难以为继，这样的经济困境能维系多久呢？”

在人们的心情被紧紧攫住之际，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道：“我们要有积极的战略，不能被动。这就是敌人从这边打过来，我们就从那边打出去，迂回敌后，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牵制进攻井冈山的敌人。这种战略，古人是早已有之的，叫‘围魏救赵’，孙子兵法中的三十六计，也有此计，我们所取的就是这个。”

毛泽东的这番宏论，使多数人恍然大悟，茅塞顿开。

“那么，我们既要守山，又要打出去，谁来守山？往什么地方打出去？前委考虑了很多。”在人们的高度关注中，毛泽东继续说下去。

“留下哪个呢？三十二团是义不容辞的，他们熟悉地形嘛。另外，还没有跟五军的同志商量，让他们也留下，与边界的民众守井冈山。”

毛泽东还未说完，红五军参谋长邓萍高声发话，不赞成五军留下，纵队长李灿、贺国中亦持同样看法。他们的理由是五军只有七八百人枪，守不住偌大的井冈山。会议的气氛为之一变，突然冷场了。

这时，五军军长彭德怀说话了，语气很坚定：“我们服从党的决议！四军、五军一盘棋嘛。”紧接着，五军代表滕代远也表态说：“大敌当前，五军理应无条件服从前委！”

彭、滕力排众议，毅然承担守山任务，毛泽东心里的石头落地，又针对打出去的方向作了阐述。他觉得湘鄂赣边界不可去，距离武汉、长沙中心城市太近；湘南也不可去，湘敌兵力太强，群众基础也受到很大破坏。最后，他把出击方向锁定在赣南。

“去赣南是合适的。其一，赣南地域广大，山区居多，距大城市远，敌人鞭长莫及；其二，赣南物资丰饶，便于解决经济问题；其三，赣南兵力单薄，比湘敌好打；其四，在东面有红二、红四团，能在军事上起到策应作用。”

毛泽东的主张，分析透彻，极具情理，切实可行，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

为时三天的柏露会议，经过一天多的争论、权衡，最后形成了这样的决策：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迂回敌后，以解井冈山之围；红五军与红四军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

代表前委赴上海中央报告工作的前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在当年的报告中写到：“1月4日边界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敌人的应付，有以下决议：……C：决定四军大部出发赣南，五军（四军之三十二团）守山移动目标，转攻敌人之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之计划，企图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之围。”

“围魏救赵”的战略确定之后，前委围绕着守山又作了一系列部署：加强红五军军政干部的配备，任命张子清为五军参谋长，陈毅安为副参谋长，将数名富有作战经验的连营干部调任五军军部参谋；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统一领导，成立宁冈中心县委，调何长工担任书记；此外，出于特别的考虑，将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

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主力3600余人，从下庄、行洲离开井冈山，踏上了充满凶险的漫漫征途。红军官兵多数人脚穿草鞋，行进在漫山皆白、雪盈尺许的崎岖小道上。

军号，在雪天长空昂响，红旗，在冷冽寒风中漫舞。彭德怀、王佐及行洲乡工农兵政府主席李焕成，还有特地从宁冈赶过来的龙超清等上千军民，站立在风雪中，怀着难言的沉重心情，频频挥手为红四军送行。王佐带着三十二团连以上干部全部到场，一个个与袁文才洒泪话别。

雪漫漫，路茫茫，红四、红五军各衔其命，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

二、冲出“重围”，会师“东井冈”

红四军征战赣南的行军路线，是行洲乡工农兵政府主席李焕成提供的、商贩们为躲避税卡而走的秘密山路，由该乡的赤卫队队员黄亚七与李江林担任向导。时令正值寒冬，大雪纷飞，大地万物都罩在银装素裹之中。山路越走越泥泞，只四五天将士们的草鞋就沤烂了，不少人赤脚行走，脚板被山石、冰碴划烂，山道

红四军与红二、四团会师旧址东固螺坑



上留下他们的斑斑血迹。但朱、毛红军 3600 余人,没有一个掉队的,更没有一人脱逃,足见政治素质之高。陈毅后来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此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记录。”

其实,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没几天,敌第七师李文彬二十一旅就开始跟踪追击。红四军下山的第九天即 1 月 23 日,部队进入大余县城的当晚,李文彬的两个团就悄然跟进,占据了城东北的制高点天柱山和惜母岭,于 24 日清晨向红军发起突袭。红四军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带着两个营撤到城外。该团党代表何挺颖指挥第三营抵挡敌军,激战中身负重伤。处于敌军包围中的毛泽东与军部机关,幸得伍中豪团长带领三十一团等部队救援过来,才突出敌围。战斗中,军部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部队转移时何挺颖又坠马而亡,三十一团的一营长周鲂也捐躯战场,在大余县城筹得的一万元银洋全部丢失。

脱险的红四军经信丰进入寻乌县境。每个官兵的粮袋都是空瘪瘪的,带出来的子弹也所剩不多了。沿途经过的大村庄和圩镇,都筑有坚固的土围子,据守在里面的地主武装猖狂得很,叫骂着向红军开枪。红军找不到地方党组织,群众也不了解红军,不用说无人来报告敌情,连找个向导都很难。直至 1 月 31 日,才在寻乌的菖蒲圩与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接上联系。按照古柏的建议,部队直奔罗福嶂山区,当夜宿营于吉潭的圳下村。

圳下村不仅没有红四军将士躲雨避寒的歇息处,反而成了他们遭敌袭击折损惨重的危难地。望日天亮之际,已于头晚赶到的敌刘士毅两个团及靖卫团千余人,以迅猛动作扑上来,将仓促应战的三十一团击溃,围住了军部和前委机关。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二十八团的一、三两个营奋力救援,将离军部百米之遥的敌军击退。军部警卫排乘时护卫毛泽东、朱德冲向村外,不顾水寒刺骨,下河涉水向外突走。部队急行四里多才将敌军甩掉,稍稍清点,发现朱德妻子、军部宣传队队长伍若兰不见了。毛泽东急得连连搓手,朱德说再等等看。不久,断后的三十一团一个连

赶上来，才得知伍若兰负伤后落入敌手。朱德惊异万分，然而无计可施。

当晚，部队露宿在尚有残雪的茶梓树林里，疲惫至极的官兵们坐在一起互相靠着睡过去。红四军进入赣南后一连串的战斗失利和损兵折将，强烈地搅动着毛泽东、朱德的思绪，朱德还要强压着失妻的悲痛，二人度过了败走“麦城”后心里备受煎熬的不眠之夜。红四军进入赣南后历经了三次战败，“损失 200 余枪 600 人(多数是作战时失去联络)，伤病员加增，弹药损耗殆尽，又无缴获补充”，诚如毛泽东同年 3 月 20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言：“是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

2 月 3 日，红四军来到寻乌县的芹菜塘，前委在一座旧庙里匆忙地召开了扩大会议，众人议定的结果是部队向吉安的东西前进，设法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联系，找个立足安身之地，再寻机回井冈山。会议还确定了应付最危难局面的办法，就是部队打散后，毛、朱等人可以在城市化名登报联系，并拟定了化名。

2 月 8 日，红四军经会昌县境来到瑞金。正要进城住下来，先头部队发现敌情。朱德指挥第二十八团击败了这支敌军。审讯俘虏得知，追敌系刘士毅十五旅第二十九团的先遣连，该团主力与第三十团就在后面跟进。朱德不敢大意，下令部队离开瑞金城向北退去，当晚在离城三十里的黄柏乡隘前村宿营。

2 月 9 日清晨，红四军继续北退，上午 10 时到了大柏地。毛泽东与朱德目观两侧山岭耸峙，树林茂密，不约而同地想到：这里是伏击敌人的好阵地。

“可恶的刘士毅，像饿狗寻食那样追击我们，不打掉这条恶狗终究不得安生！”毛泽东愤然道。

“是呀。生死存亡这一仗了，打吧！”朱德坚定地回应道。

2 月 11 日这天，正是 1929 年的大年初一，红四军的官兵却饥肠辘辘，忍受着凄风苦雨，埋伏在大柏地南去不远的前村两侧山上，等待敌人的到来。午后 2 时，在黄柏、壬田两地大酒大肉过